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全力推动下，在粤港澳三地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一伟大工程中，文学界也应有积极的担当和作为。

粤港澳三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共十九大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既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更好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也为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便捷的路径和重要的平台。粤港澳合作已经推行多年，经济贸易关系和人员往来密切，近年来在基础设施方面也逐渐地衔接，但是，由于三地有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三种货币，之间的深度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上其他湾区的最大区别。

一、以文化力量拉近心理距离

要全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排除这些障碍。有些问题和障碍是制度性的，但不可否认，很多问题和障碍多年解决不了，深层的原因是人们存在认识的差异和心理的距离。如果不减少三地之间的认识差异和心理距离，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大湾区发展战略的意义，很难全面达成对大湾区发展战略的共识，粤港澳三地也不可能充分、高效地形成合力，共同为新时代中国发展贡献最大的力量。

人们一般从经济意义上去看大湾区，将大湾区视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但粤港澳大湾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性，要建设好经济共同体，首先要建立文化共同体，以文化的力量化解认识的差距和心理的距离，才能逐步解决制度的问题与障碍。

况且，粤港澳三地本为一家人，同属岭南文化，同宗同源，同声同气，习相近，人相亲，心相通。近代行政上的人为分割和制度上的差异，虽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特殊性，且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还放大了这种特殊性，但从根本上看并没有割断文化的脉络和感情的纽带，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粤港澳居民携手并肩发展，才有了相当多的共同生活经验，完全具备建立文化共同体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只是我们受到很多表象的干扰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只要三地有了这种意识和愿景并主动去推动，配以适当的政策，就水到渠成。有了共同的精神家园，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二、以文学为建设文化共同体的平台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有很多路径选择，但我认为，文学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文学的表达非常细腻、感性、形象，容易打动人心，容易引起共鸣和共情，促进心灵相通。而共同的文化渊源、风俗习惯和生活体验，又便于共性的创作。因此，我们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概念，作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平台。

大湾区文学应该是区域文学，如何从学术上定义或者从理论上建构，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问题，在实践中会逐渐明晰。由于地理的原因，大湾区文化传统基因保存完好，长期与世界的接触交流又赋予其极大的开放精神和创新能力，这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所



吴志良

体现。大湾区文学必然要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放眼世界，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真实反映港澳地区的历史演变、文化性格、精神面貌、城市内涵和人民生活，彰显其独特的时代精神和区域特色，在中国文学大家庭里独树一帜。

港澳回归祖国已经20多年，我们不应该再将港澳文学放在世界华人华文文学中来考察。港澳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港澳文学也应该回归中国文学主流，与其他兄弟省市一样，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大家庭里的一份子。我们很希望，内地文学界更加关注、重视和支持港澳文学的发展，文学报纸杂志也能刊登更多港澳的文学作品和港澳的文学批评文章，共同推动港澳文学的繁荣，促进大湾区文学的成长。同时，充分认识到港澳文学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更好地发挥港澳的网络和平台优势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学。而大湾区文学就是港澳文学回归中国文学大家庭的一条有效路径，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优质平台。

三、以机制创新推动大湾区文学的成长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提出之后，得到9+2城市的积极响应、支持和参与。2018年在深圳举办的第一届大湾区文学发展高峰论坛，各地都派出了作家协会或文学团体的负责人参加。论坛还邀请了作家和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大湾区文学建设。在这次论坛上，大家都认为构建大湾区文学有其必要性，也存在学术上的可能，并且对大湾区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各地文学机构负责人还达成了共识，希望建立恒常的协调机制，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共同推动大湾区文学的成长。

应该说，这次峰会提出的许多建议已经逐步落实，前景令人期待。2019年，我们在深圳举办了第二次峰会，之后又在广州和澳门分别举办了峰会，发表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倡议书，共同传承中华文脉，共同讲好湾区故事，共同推动融合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峰会已经成为了共商大湾区文学发展的平台和协调机制。随后，暨南大学举办了大湾区文学研讨会，从理论上探讨建构大湾区文学的可能性。目前，《大湾区文学评论》已经创刊并公开发行，成为了大湾区文学建设的重要阵地。

为了从机制上推动湾区文学发展，广东省主动牵头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密切三地文学界的联系，团结和凝聚大湾区文学力量。根据《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战略合作协议》，要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名家造就工程”，包括创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院、实行“文学名家造就计划”；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精品工程”，包括扶持大湾区题材创作、设立大湾区文学奖、出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双年选》、扶持创办大湾区文学杂志、推出大湾区文学年度排行榜；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互动工程”，包括开展三地文学互动活动、抓好文学人才培养、加强青少年文学交流、推动文学创意融合；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传播工程”，包括建好广东文学馆、推动国际华文文学交流合作、推动大湾区文学国际传播等。

我们希望，疫情缓解之后，在中国作协的指导和帮助下，可以尽快落实大湾区文学建设各项举措，推动大湾区文学的发展。当然，我们尤其希望更多的文学研究机构关注大湾区文学的建构并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令大湾区文学构建早日成为现实，令大湾区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支先锋队。

四、从理论上构建大湾区文学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和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存在许多学术的可行性。互文性文学理论，是路径选择之一。

简单来说，大湾区文学就是在广东、香港和澳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大的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有文本的对话、主体的对话和文化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三地文学从不断交流、合作和融合，从引用、改写、吸收、扩展到改造，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形成很大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恰恰是大湾区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主体的对话也如是，最终的目的还是达至三地文学创作者共同参与、主体有共享和共同创造，打造一个新的文学流派。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对文化的一个重新认知过程，对三地文学都会带来不同的冲击和体验。但是，如果大家都有意愿去走这个过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就自然地构建起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还必须和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产生关联、进行对话。在这个更大体系的对话过程中，粤港澳文学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前提是，大家一定要解开心结，放下成见，真诚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学习。

我们提出大湾区文学概念的初衷，是为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港澳文学回归中国文学大家庭建立畅通的渠道，也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交流搭建一个新的平台。我们相信，在构建大湾区文学的过程中，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可以对中华文化传统有更系统深入的认识，广东文学也可以更加全面广泛地开展与西方文学的合作交流，而三地文学可以增进理解、互相接受、共同进步，最后融为一体，成就一个新的文学共同体，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最大的贡献。

近期，赵稀方和霍艳联合主编的《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共同推出。

《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聚焦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汉语文学，探讨这一时期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理清转折发生的线索，思考其深远意义及对当下汉语文学发展的影响。本书以四个主题展开讨论：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及其文学实践、知识分子的道德选择、不同地区的文学生产与文化运动。作者均为该领域的一流学者，其中不乏年轻一代的学者，展现了近年来当代文学领域研究的高水平和新思路。本文为《转折时代的汉语文学》序言，略有删节。

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放在一起研究是不多见的，因为它们分属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个学科。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个学科面貌完全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话语系统，至于其间的关系、如何转折、如何衔接等问题，较少有人关注。而这处关节其实恰恰是非常关键的，是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点，其实并非我们独家发现。一两年前，我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参加过有关于1949年及时间空间变动的讨论会。2017年，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我们策划召开了“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之交的汉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个题目要求分别邀请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参加，仅此还不够，我们又加上了一向鲜少被注意的台港澳华文文学领域的学者以及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欧洲等地的外国学者。另外，我们在邀请专业学者的时候，尽量注意年轻化，如此就使得我们这次会议活力十足。不同的历史经验在这里浮现，不同的学术视野在这里碰撞，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冷川从纸张供应的角度讨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型过程，这一“经济基础”的角度非常独特。张泉打破了以1949年戾戾割裂共和国新文学的方法，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仍然保持了几份延续着旧文人写作的小报，如《晶报》和《大报》，由此探讨新旧文化秩序之间的转换。熊鹰以叶君健等人的活动为线索，探讨1950年代对于1940年代以来“反殖民主义”主题的延伸和发展，这是从前较少为学界所注意的主题。李哲由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的摄制过程，分析彼时新中国“美学”的诸种构建过程。祝鹏程则以“十七年”（1949—1966）的对口相声为中心，探讨新中国政治文化及美学观念对于相声这一体裁的重塑，等等。

不多见的是，翻译文学研究也出现于会议中。晚清、五四以来翻译文学一直是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1949年后被归到外国文学学科，翻译文学从此与中国新文学脱离了关系，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李今的发言来自她近年出版的多卷本《汉译文学序跋集》，主要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新政权下的社会主义新认同的关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崔峰认为，在苏联文学得到张扬的同时，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却受到了限制，美国文学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重构的过程。

左翼文学之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有怀抱，金浪《不合时宜的“政治美学”——朱光潜1948年前后的书生议政及其失败》和贵科安《中国舞台的歧途——萧乾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构想》等文，揭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类政治想象。李斌《论沈从文土改期间的创作矛盾》、冷霜《废名1950年代的思想转变与创作意愿的升沉》、叶诚生《〈春城纪事〉建国前后的常任侠》等文，则探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旧文人在生活选择上的冲突和彷徨。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界以五四启蒙主义为导向，重新引进西方文化，“走向世界”。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经济，不过在此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和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启蒙主义”的问题逐渐浮现，左翼文学的遗产亟须重新整理。程凯的“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何吉贤《“流动”的主体和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20世纪四五十年代转变之际的丁玲》等文，重新反思启蒙和革命的关系，将知识分子置于革命实践中加以考察，发现被忽略的左翼革命实践的历史遗产。

迄今为止，我们的探讨都是从大陆出发的，这其实远远不够。一旦将港台及海外纳入了会议，我们便获得了新的历史视野。1949年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得以延伸，但右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以至于通俗文学都分流到了海外，离开了这些部分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无疑是非常片面的。王钰婷以台港两地《纯文学》杂志为考察对象，讨论五四女性文学传统的传承与转化。黄万华提到，《中国新诗总系》（1949—1959）原由洪子诚承担，他在大陆部分只选了6首诗，剩下的全是台湾诗，后来由谢冕编辑的时候，则选了大陆诗139首，台湾诗只选了32首，香港诗缺席，显然前者较为注意五四新诗传统的延续，而后者较为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诗歌的发生。黄万华认为，解放区文学进而扩展为共和国文学，国统区文学则分流为港台及海外文学，前者是“人民的文学”，后者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这两者应该都是不可或缺的。朱寿桐对于1949年后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提出了根本质疑。在他看来，19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尚有可能让人们在“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找到联系，而“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出现倒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然而这一新的学科概念完全是非历史的。号称中国现代文学，却忽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又放弃了现代的文言文学，并且又不能涵盖台港澳海外汉语文学。

对于台湾来说，转折与其说是1949年，不如说是1945年。作为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其历史脉络与大陆有相当不同。就文学而言，其中一个不同就是语言的转换，即光复后台湾作家从日语到中文写作的转换。刘俊《从“日语”到“中文”——论吕赫若小说中的认同与背离及语言转变的意义》和李育霖《历史的褶皱——论陈千武的翻译书写》等文，从语言和翻译的角度，讨论了在历史转折期间台湾作家的主体转换过程。台湾的历史转折，其过程恰恰与大陆相反。如果说大陆是左翼合法化与体制化，那么台湾当局则是清除和斩断左翼。陈美霞以赖和的遭遇为例，讨论1950年代冷战格局下“去殖民”被“反共肃清”所代替，乃至导致分离主义的过程。李娜则对于台湾20世纪五十年代现代主义与左翼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讨论。张俐璇以上官鼎为对象，考察了19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对武侠小说发展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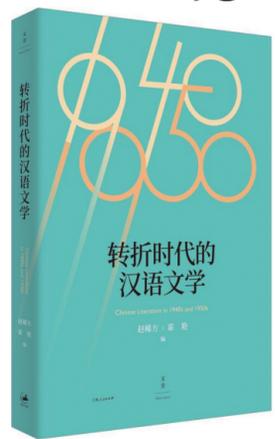
如果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让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从中国大陆分流出来，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补充，那么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而言，意义又有所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从中国文学转变为所在国文学的过程。正如朱崇科所说，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之争，发生在二战之后的历史背景下，而1957年马来西亚建国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朱崇科《论“马共”题材小说再现的类型化》和金进的《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殖历史再现——汉素音与〈餐风饮露〉中的人道主义情怀》的“马共”及“左派”题目就可以看出，马华文学与中国之间有深刻的历史联系。

我们邀请到波兰罗兹大学学者马里乌斯·格沃布参会，他介绍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及文学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也介绍了波兰文学的时代性境遇，这与中国的历史际遇形成了呼应的关系。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张谓圣教授则不满足于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美国文坛的影响，她从台湾出发，试图从理论上讨论“世界文化体系”与东亚文坛的关系。

这让我们知道，中国乃至东亚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代转折与世界具有同构性，1950年代香港、台湾文坛所受到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正来自欧洲，而中国大陆对苏联文学的引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聚集。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香港，再到欧美，随着空间的推移，我们的视野在一步一步扩大，终于能够在世界性的冷战结构中观察自己的位置。

不同历史经验的浮现

赵稀方



书讯

《海边的房间》是台湾新生代小说家黄丽群的短篇小说集。十二个坏掉的人，十二个令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好故事。小说家用典雅细密的汉语精巧布局，将人间悲欢斩落整齐，写出一个城市畸爱者的幽冷世界：老公离异的弃女和养父，乡间卜算师与患病的儿子，梦游的宅男，中年独居女人和三花猫……语言的俏皮与一个个意料之外被冻住的结尾以及对平凡人事细致入微的体察，构成作品特有的文字张力。无常常往最平常，黄丽群的世情书写温热冷艳，拨动平凡市井里的人心与天机，失意人的情欲与哀伤，我们日常的困顿与孤独。

小说集《海边的房间》收录了黄丽群大学刚毕业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中，一些主题反复出现，比如置身于文明社会的处世之道：在酒店大堂打工的父亲传递给女儿的成功要诀是“当一个坐着的人”，因为坐着比站着更体面（《当一个坐着的人》）；做算命师傅的爸爸告诉儿子，要算准顾客的头命首先要断定他们的身份和期待，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出发，推演他们的未来命运（《卜算子》）。黄丽群对这样的“处世之道”的态度是含混的，既有同情的地方，也有讽刺的余地。就像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她不喜欢斩钉截铁的东西，喜欢不科学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



谈论人们无法主宰的、无力抗拒的东西，比如爱与命运，正是这些东西能够折射出人类知识的有限。

这些故事讲述的都是都市中人的生活，他们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干着一份平常的工作，是房产中介、公务员或是外企白领，却怀揣着不为人所知的激烈欲望，这些欲望有时凝结成了一种迷恋和“病症”……在采访中，她面对“城市畸零人”与他们不可抗力的命运的问题，说自己其实并不赞成边缘人的说法，“我觉得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普通人会碰到逼着他们不普通的命运和事情。”（华雯）



刘小东油画作品

华馨 唐建成书 HUA XIN